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GUOJIA SHEKE JIJIN CHENGGUO WENKU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ZHONGGUO ZONGJIAO YU ZHONGGUO WENHUA

余敦康 吕大吉 牟钟鉴 张践 合著

卷 二

宗教·哲学·伦理

余敦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GUOJIA SHEKE JIJIN CHENGGUO WENKU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ZHONGGUO ZONGJIAO YU ZHONGGUO WENHUA

余敦康 吕大吉 牟钟鉴 张践 合著

卷 二

宗教·哲学·伦理

余敦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二) 宗教·哲学·伦理/余敦康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

ISBN 7-5004-4761-2

I. 宗…

II. 余…

III. 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751 号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二) 宗教·哲学·伦理

余敦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电话:010-8402945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北京盛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1.5 印张 35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4-4761-2

定价:33.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GUOJIA SHEKE JIJIN CHENGGUO WENKU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陈振藩 雁 声

责任校对：李小冰

责任印制：戴 宽

封面设计：肖 辉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集中展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文库》将陆续选编经专家鉴定为优秀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几家出版单位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4年10月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卷一 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吕大吉 牟钟鉴 著

卷二 宗教·哲学·伦理

余敦康 著

卷三 宗教·文艺·民俗

牟钟鉴 著

卷四 宗教·政治·民族

张 践 著

总 序

在历史长河中，传统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无论是宗教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的影响，还是各种形式的文化对于宗教的影响，都是巨大而且深远的。这个历史事实，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普遍根据。^①

意思是说，宗教作为颠倒的世界观，用神圣的名义构建出了“这个世界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论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在政治制度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义性，为苦难人民提供感情上的慰藉。马克思事实上承认了传统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对哲学、政治、道德和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的深刻影响。毛泽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也有类似的评论。他在1963年关于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批示中说，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所说的“批判神学”理解为对宗教进行理智性的批判研究，那么，毛泽东事实上也承认，在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中渗透着宗教神学的作用和影响；不了解宗教神学在历史上的这种作用和影响，就搞不清，更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世界史。当然，马克思和毛泽东对于传统宗教之社会文化作用的评价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其实，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圈内，早已成了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争鸣齐放，很是热闹。对传统宗教的文化作用持马克思、毛泽东一样的否定性的批判态度者有之，但给予肯定性评价者亦有之，而在西方世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就更多一些，在这个领域内，俨然成为学术的“主流”。

在我们中国的人文学术界，随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对于传统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被学者热心地关注起来，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理论和学说。尽管他们的具体论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反对，但对传统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的重要影响却是一致承认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关于中国传统宗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人文学术性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基本上中断了。毛泽东关于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的指示，在实际学术生活中不是表现为通过对宗教的理智性批判，来加深对哲学史、文学史和人类社会生活史的理解，而是变形为通过哲学史、文学史和中外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政治上的“大批判”，以加速宗教在历史上的消亡。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才逐渐变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各行人文学者，特别是宗教

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宗教本身不仅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而且自它创生以来，对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其他各种文化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提出了对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文化”进行重建的问题。学者们特别关心的是，在我国当代和未未社会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中，宗教应该和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文化学术问题。我国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正就此进行热烈的探讨，发表了各种值得重视的意见。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激起了我们的学术关切，学界朋友的各种高见也引发了我们参与讨论的兴趣。于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就列进了我们这几年的研究计划之中。

总的说来，我们四人对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上具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正是这些共同的学术观念把我们凝集在一起，从事这项学术研究事业。

我们的基本共识主要有四点：

第一，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历程是一脉相承的连续体，没有人类在既往历史中的文化创造，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更谈不上来来社会的文化建设。如果我国要发展现代，建设未来，那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有一个清晰而透彻的了解。因此，要说明我国的宗教在未未社会的文化建构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我们就必须具体研究从古及今的中国宗教史和中国文化史。只有具体而非抽象地、深入而非空泛地研究传统宗教与各种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事实，我们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文化的现在，也才能比较科学地设想和建构它们在未来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第二，中外学术界关于宗教—文化关系的学术纷争，究其原因，常常是由于对“宗教”和“文化”概念，宗教究竟为什么是

一种文化，又如何作用于其他文化，反过来，其他文化又如何作用于宗教等基本问题缺乏哲理性的深层探讨，作出了随意性的规定。我们的研究力求避免这种偏向，努力把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关联的具体说明建立在宗教与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上。

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敬天法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宗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周公旦通过“制礼作乐”使之完善化，形成一种具有浓烈宗法伦理色彩的宗教文化——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哲学本质上是这种作为宗法伦理宗教的礼乐文化的人文化的产物，它在西汉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独尊至上的国家哲学和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同时也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教义，儒家哲学教人以“忠君孝亲”之义，国家宗教则行之以“崇天祭祖”之仪，二者实质上是本质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儒家作为国家哲学的至上地位事实上也被后来兴起的通教和外域传来的佛教和其他宗教所接受和承认，把奉行儒家伦理规范、完善通德人格作为善有善报以及成佛成仙的一个重要标准。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以宗法伦理为中心的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而它并非宗教。所谓一切文化皆以宗教为其核心的说法，尽管在学术领域广泛流行，但到底有多大的普通意义是大可怀疑的。

第四，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文化史、思想史证明了的普遍原理。根据这条原理，我们在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确立了一条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这就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去说明中国的宗教，而不能倒过来用中国的宗教去说明中国的文化。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宗教研究中的体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过：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宗教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宗教。按照我们的理解，广义的“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人类的全部历史实质上也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历史。

上述四条，仅只是我们四人在这个领域内的基本共识，至于其他方面的共识，就不在此一一尽言了。当然，在不少的具体问题上，特别在学术论证的具体方法和表达观点的具体方式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个性。我们认为，这种特殊性或个性在文化学术研究中是应该受到尊重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学术。强求一致，固执现点和体系上的整齐划一，只会窒息文化和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灰暗无光的荒漠。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因此，我们在合作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这一共同课题中，虽有基本的共识，但却努力保持每个人的学术个性。我们不打算、也没有去建构一个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问题的严整一致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努力就此问题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解答的问题，叙说一些我们个人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发来一些纯属个人性的一孔之见。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上，彼此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有可能互相对立。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文化学术研究的方式，也许更有利于文化学术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合作研究的成果按专题内容分辑为四个单行本付梓问世：

一、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吕大吉、牟钟鉴）

二、宗教·哲学·伦理（余敦康）

三、宗教·文艺·民俗（牟钟鉴）

四、宗教·致治·民族（张践）

我们选择的这种处理学术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写进四个专

著单行本中的学术见解能否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那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所能决定的，我们真诚地期待著读者的批评。

吕大吉

2003年10月

自序

在这个“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集体科研课题中，我接受了课题主持人、我的朋友吕大吉教授的建议，承担了“宗教、哲学、伦理”三个小的分支性的课题。经过多年的努力，集结了若干篇文字，算是完成了任务，交出了答卷。但是回头重新审视，觉得留下了许多遗憾，内心并不自安。清人龚自珍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想到古今谁也难免这种苦涩的无奈之感，也可以得到一点暂时的宽慰。

实际上，自清末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冲击下，如何对中国文化做出合理的定位，以便进行有效的回应，一直是中国学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宗教、哲学和伦理，更是探索的重点。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建立，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虽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成果，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给人留下总的感觉仍然是“未济终焉心缥缈”，困惑大于确信。我是这个探索过程的后未者，对于前辈学者的探索成果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由于问题本身难度极大，人各异说，歧义横生，与其说我继承了他们的确信，毋宁说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的困惑。就我个人的专业知识而言，关于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的文献资料以及历史上的种种经验事实，或多

或少总算有一些了解，我所感到的困惑关键在于找不到一套诠释系统，形成某种确定的看法，把零碎零碎的专业知识提升到文化自觉的理论高度。当年王国维曾经把他的困惑表述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的吊诡。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克服矛盾，摆脱困惑，看来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立足于客观的理智，走由信而生爱之路，另一种是立足于主观的情感，走由爱而立信之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西学与中学的选择，选择由信而生爱者表现为西体中用，选择由爱而立信者表现为中体西用。但是，从前辈学者几代人的探索经历来看，这两条道路都没有走遍。王国维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挚爱，选择了由爱而立信之路，最后却因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走向自杀的悲剧。金岳霖的哲学探索开始是以西学为主，从知识论入手，选择了由信而生爱之路，最后却因知其可信而不能爱，回到中国文化的本原寻求情感的满足。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宗教、哲学、伦理各个领域都为全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享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挚爱成了一种天性。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由爱而立信，把情感的挚爱提升为理智的认同，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证明中国文化既合情又合理，使之形成中国人的自觉的文化意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为了形成对自我的清醒的认识，如果不以他者为参照，是绝无可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条脚注中曾经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① 在当今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促使各个民族间发生普遍的交往，而全球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化的浪潮是以西方的强势文化为主导的。因而中国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进行中西比较，并且通过西方文化的镜子来反映自己，才能做出合理的自我定位。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化既不可爱又不可信，唯有西方人自己的文化才是既可爱又可信的，当中国人面对着西方人的这面哈哈镜的扭曲的反映，是绝无可能认识到自我的真实面貌的。这么说来，自从中国的弱势文化与西方的强势文化相通之时起，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了自我认识，不能不通过西方文化的镜子来反映自己，另一方面，为了如实地认识自我，又不能不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矫正西方镜子中的那个扭曲的映像；一方面，根据文化力量强弱对比的考量，不得不在理智上承认西方文化具有更大的可信度，代表了客观的真理，另一方面，出于中国人的无可改变的天性，又不得不在情感上对中国文化倾注更多的挚爱，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尽管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显示了顽强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总的说来，并没有走出这种尴尬的境地。当然，21世纪的中国毕竟不同于19世纪末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弱势地位有了某种程度的提升，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预见，必将再现辉煌，迎来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但是，由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无论是选择走由信而生爱之路还是选择走由爱而立信之路，都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文化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仅难以确定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一以贯之的文化战略，也无法想见来来的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总体面貌。我所承担的这个研究课题，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宗教、哲学和伦理的诠释为中国文化做出合理的定位，之所以不敢确信而感到困惑，是从属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的。

虽然如此，我在这项研究中，还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主要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的看法。在中国哲学中，一向重视复归本原的思考。比如老子曾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见《老子》十六章）《周易·复·彖》：“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注说：“复考，反本之谓也。”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源头是本根，流派是分支，由于流派对源头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的关系，所以为了穷究中国文化的底蕴，把握它的特色所在和本质特征，如果追本溯源，从发生源头的本根处着手，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进行文化本原性的宏观比较，为中国文化做出合理的自我定位，也许是切实可行的。我的这个设想似乎有点道理，但是认真做起来，却是力不从心。因为从源头到流派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全过程，只有坚持不懈从头到尾走完了全过程的人，才有资格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现在所交出的这份答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连中程都没有这到，更谈不上终点了。就拿我的开头起步来说，也是竭尽了全力，之所以半途而废，走不完全程，根本原因在于“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就是无奈，就是遗憾，免不了产生“来济终焉心缥缈”的感慨。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的庭院中，置放着一块奇异的巨石，中有一孔，宛如文章中的逗号，象征中国现代文学至今并未画出圆满的句号，仍然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过程，不断地画逗号。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情形亦复如是，想到我们这些有幸跻身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同仁，如果能在这项宏伟的事业中画出一个逗号，不应该感到无奈和遗憾，而应该感到是一种难得的欣慰了。

余敦康

2003年10月

目 录

上篇 中国宗教与哲学

一 夏商周三代宗教

- 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 (3)
- (一) 哲学起源于宗教 (3)
- (二) 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11)
- (三) 尧舜时代的宗教 (18)
- (四) 夏代宗教 (23)
- (五) 商代宗教 (32)
- (六) 周代宗教 (44)
- (七) 洪范九畴
 - 天命神学的完整表述 (56)
- (八) 西周末年宗教信仰的危机 (71)

二 春秋思想史论

- 哲学突破的历史进程 (88)
- (一) 中国哲学发生的三个阶段 (88)
- (二) 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 (90)
- (三) 历史文化结构的转型 (101)
- (四) 天命神学结构性的分裂 (120)
- (五) 义理之天的文化内涵 (133)